

传播技术理论的现代历程及其文化反思

梅琼林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关键词] 传播技术;传播技术理论;传播学;文化反思

[摘要] 由于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应运而生,而传播技术理论也日益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传播技术理论的提出一方面得到了学者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在文化层面上对其提出了种种质疑。正是有不同声音的出现,传播技术理论乃至整个传播学理论生态才能更平衡地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1X(2006)04-0076-05

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与其它领域研究的红火相比,传播技术理论的研究似乎一直处于偏远的角落。显而易见,在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学者们所关注的是传播媒介的信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而媒介技术本身的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媒介技术的形态变化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现在看来,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尤其是在麦克卢汉之后,传播技术理论已经逐渐在传播学领域中站稳了脚跟,并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因此,对传播技术理论的现代历程进行考察,并在文化层面上进行反思,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现代传播学的兴起

在学术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某个学科的形成发展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时间差,传播学尤为如此。可以说,伴人类的出现,传播现象就随着产生了,而研究它的传播学却是一门极其年轻的学科。这与其它学科的形成相比同样可以看出来,比如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乃至与其它一些自然科学相比仍然显得姗姗来迟。无疑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传播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改变社会关系、形态中占据多大的分量,或者说传播技术本身的影响力多大时,才可能促使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出现?

在人类诞生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可能只能靠一些简单的动作或物件来表达和交流,随着语言的诞生,人类的传播行为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仅仅依靠语言进行传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这种稍纵即逝的语言符号难于持久、

长距离地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传播,于是人类创造了文字。毫无疑问,文字的出现,不管是对整个人类文明而言,还是就传播活动的发展而言,其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然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当文字出现以后,在传播活动中,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新的问题出现,这是很简单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用什么介质来记载文字,如何把文字保存到这些介质上,以及这些介质如何保存和传送等等?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当然,与文字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相比,这些问题显得微不足道,而且人类好像也很轻易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因而这些问题也就很少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然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恰恰是这些看似简单的命题,构成传播学的重要内容,而对传播技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而言,更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史学家眼里,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出现似乎都不是很重大的事件,至少我们今天所见的历史文献中,都很难见到具体的记载、描述和评价。甚至连这些发明的“专利权”属于谁、具体产生于什么时间都还有争议,只能从一些考古文物或者不太确切的历史文献中去推测。尽管今天造纸术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而印刷术则常被视为信息传播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但在漫长的历史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作用和意义都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肯定。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印刷术是中国早就有的;但是,只是为了付印而且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种印刷品(尤其是报纸和期刊),却只是在西方才得以问世。”^[1]的确,造纸术和印刷术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显然都无法让人满意,但对近代欧洲却有着无比重要的作用。15世纪

四五十年代,德国人约翰·古登堡重新发明出活字印刷术,这项技术很快就被广泛应用。据说,仅从1448年到1450年,欧洲246个城市建立了1099个印刷所,印刷了4万种共1200万册书^{[2]347}。此时正值欧洲文艺复兴的开始,大批宗教书籍、记事性小册子以及印刷新闻纸的出版,使得被垄断在中世纪僧侣阶层的文化得以迅速传播到世俗社会,新思想的涌现成为统治者无法遏制的潮流。恩格斯就此写道:“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业已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接受较高级的教育状况。在知识领域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3]391}显然,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传播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形态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人类的这种意识进入19世纪以后显得更为强烈了。从19世纪出现的电报、电话、电影,到20世纪的广播、电视、卫星通讯、计算机网络,传播技术的发明和进展,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甚至已经不可或缺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陈力丹先生说,电报是第一个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的发明;电话无形中打破了个体间保持适当距离的社会规则,它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只有在朋友和情侣间才被允许的耳边呢喃的距离;电视将不同类型的人群带到了相同的场景,于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电视面前变得模糊了;而网络传播则进一步提供了隐去身份、同步参与交流的条件^[4]。可见,传播技术的进展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形态。诚如美国学者保罗·利文森所说的:“任何信息技术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复杂的意料之外的结果,加上我们能够对信息技术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和可能的调整——我们登上了一个有关信息技术发展历史和发展未来的旅程,一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对我们的世界产生影响的旅程,一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如何影响未来世界的旅程。”^{[5]10}

于是,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了,而且是在现代传播技术最为发达、运用最为广泛的美国。很快,在传播学这个学科领域内,传播技术理论也日益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英尼斯与传播技术理论研究先河的开创

关于传播技术理论研究的兴起,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是两个颇有意思的人物。人们最早对传播技术理论的关注,无疑来源于麦克卢汉。这位在20世纪中叶如日中天的加拿大学者,以一系列看似异想天

开的理论引起了学界的轰动,从而使广大的传播学者意识到传播技术理论研究的存在和意义。然而,慷慨的麦克卢汉毫不居功,相反,他极力推荐另一位在传播学界不为人所知的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并坦承自己的思想深受其影响,英尼斯才是真正开创传播技术理论研究先河的人。于是,英尼斯逐渐进入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现在看来,一向喜欢夸大其辞、甚至是信口开河的麦克卢汉,这次并非虚言:英尼斯对传播技术理论的确有着天才的预见和洞见。

英尼斯生于1894年,早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加拿大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原料贸易”与加拿大殖民经济的关系。他的第一本著作《加拿大的皮毛贸易》发表于1930年,描述的是运河、铁路等交通系统以及关税制度等工业化现象,并阐释了加拿大的发展如何受到欧洲皮毛需求、加拿大原料的开发与技术革新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英尼斯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文明的中心与边陲地区之间的差异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1940年,在另一本著作《鳕鱼业:国际经济史》中他进一步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在这些著作里,英尼斯已经意识到,传播系统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帝国权力的扩张之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正是交通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帝国权力的扩张。正是在这些经济学理论著作中,孕育了英尼斯传播技术理论的原型。

英尼斯的传播技术理论在1950年代逐渐成型,主要体现在《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这两部著作的发表。在这两部著作中,他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任何文明都可以被视为具有主要传播工具的功能,传播技术是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模式的决定性因素。显然,在这里已经有了后来麦克卢汉所发展的“传播技术决定论”的印记。英尼斯对传播媒介技术的作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他认为:长期利用传播媒介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所传播知识的性质,其普遍的影响将最终创造出一种使现行生活方式和灵活性难以维持的文明,而新媒介的优势将会导致一种崭新的文明^[6]。

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那么,英尼斯看起来与此并没有太大的联系,他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政治经济学,介入了传播的研究。他认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和贮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从这个角度出发,英尼斯发现:社会组织的变化、主体性的形成以及知识的组织化都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而且传播媒介的进步有助于于一

定社会阶级的知识和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原因是传播媒介具有偏向性:传播媒介或偏向于时间,或者偏向于空间。偏向于时间的传播媒介易于长久保存但却难以运输,比如一些重型的材料:羊皮纸、粘土和石头等;偏向于空间的传播媒介易于远距离运送但长久保存性比较差,比如轻便的纸莎草和纸张等等。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前者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有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后者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中的贸易,便于帝国领土的扩张,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不强的社会体制。从这个结论出发,英尼斯找出了媒介和社会的对应关系,即传播技术形态决定了社会的组织形式。这可以说是整个传播学史上最早对传播技术进行的系统化的理论研究。

因此,麦克卢汉在《古登堡群英》中说:“英尼斯第一个在理论上处理了与技术形态本身有关的变化过程。和他的工作相比较,我的工作只不过是他的著作中的位于页面下方的注释。”^[7]无疑,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英尼斯在传播技术理论研究历史上地位的评价。

三、麦克卢汉与传播技术决定论

尽管麦克卢汉谦称自己只是在为英尼斯的理论作注释,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传播技术理论研究历史上的决定性地位。中国传播学者张咏华指出:“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8]60}1960年代,麦克卢汉先后出版了三本传播学专著:《古登堡群英:印刷文人的诞生》、《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和《媒介即信息》,在这些著作中,麦克卢汉提出了一系列大胆新颖的媒介理论,不但迅速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而且使麦克卢汉成为名重一时的新闻人物,在美国媒体中频频亮相。这不能不说是传播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麦克卢汉的独特个人行为风格,使得传播技术理论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关注。正是麦克卢汉的出现才真正确立了传播技术理论在传播学研究领域里的应有地位。

与英尼斯一样,麦克卢汉也把传播当作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文明现象,但他关注的不是传播和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而是传播媒介如何对人类感觉中枢产生影响。他提出一个在当时颇令人惊异的观点:媒介是人类感觉器官或身体功能的巨大延伸。每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因为产生感觉分离而在文化中创造不平衡,改善“感官的关系”。当任何一种感觉

或身体的功能以技术的形式具体化时,官能的分裂和各感觉之间比例上的变化就出现了,从而结构出人体感官新的感应性轮廓和复杂性,如时间延续、影响范围、速度和幅度。比如听觉有利于发展人类的情绪和直觉经验,而印刷术的发明巩固并扩大了视觉在应用方面的知识可能性,从而与拼音文字区别开来。与印刷的书籍比较,中世纪的手稿是不清晰的,常常被读出声来,需要视觉和听觉的相互交流。印刷书籍由于加重了视觉偏向而进一步分裂了感觉生活,阅读成为更个人化的沉默行为。书本的方便携带也造成了对个人主义的崇尚和理性批评精神的诞生,推动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陈卫星先生认为麦克卢汉在传播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第一,麦克卢汉提出了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不是表述,而是媒介自身。这就是说,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就会引起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不管这种媒介传播什么内容。传播媒介的影响并不是出现于有意识的意见和观念的层次上,而是在感觉比例和知觉类型的下意识层次上,传播技术的任何进展都会引起人类事务的规模、步伐或类型上的变化。

第二,麦克卢汉把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的文化分析上。也就是说,所有的媒介都是人的某种心理和肉体能力的延伸,如印刷品是人们眼睛的延伸,收音机是人们耳朵的延伸,电视机是耳朵和眼睛的共同延伸。任何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会使人的感觉器官的平衡状态发生变动,产生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影响。

第三,麦克卢汉的理论叙述表现了美国式人道主义标记的乐观主义情怀,客观上反映了西方1960年代崭露头角的大众消费福利社会的欢欣气氛和技术发明改变世界的愿望。从技术表现性能的完整和完善出发,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时代是口头表达方式的光荣再现,是推动人性统一的媒介文化的重新“部落化”,可以重新创造普遍的全球性社会和谐^[9]。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技术决定论者,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技术进行了超乎寻常的赞许。他希望以此来呼吁人们将注意力从媒介内容转向媒介本身,重视媒介本身的社会影响。然而,恰恰是这样,麦克卢汉在夸大了媒介技术对个人与社会影响的同时,却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对媒介技术的作用,因此被扣上了“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帽子,遭到了许多批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上,传播媒介第一次被如此充分地、乐观地加以

肯定,也是第一次被置于如此之高的地位,这也在无形中加强了传播技术理论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地位。

四、麦克卢汉之后传播技术理论的新发展

尽管麦克卢汉在一段时间里曾经风光无比,但他头上的这种光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播学界对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的不满和鄙视同样溢于言表。这种现象在经验主义盛行的美国尤为明显。因为在经验主义者看来,只有一种理论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并且其效果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检测,才能被承认一种科学。因此,经验实证主义被奉为传播学的正宗。而麦克卢汉那种天马行空的思想 and 表达方式显然不在这个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之内,他对被媒介影响感官的关注远远胜过对其内在逻辑关系的关注。这注定了麦克卢汉在当时终究没办法真正进入传播学研究这个学科领域,也没有取得应有的合法性地位,这种情况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尽管如此,麦克卢汉的传播技术理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当年威廉斯在批判麦克卢汉的唯技术决定论时,也不得不赞叹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的顽强生命力,并预言麦氏的理论必然有后继者。他说:“虽然麦克卢汉的理论的特定的语言辞令不大可能长久延续,但是该理论之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一种观念形态的表述之例子,即视技术本身为原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某些特定的表述公式失却其感染力时,这种理论还会有后继者。”^[8]¹¹⁷威廉斯的预言是正确的,现实果真如此!

张咏华教授认为在麦克卢汉之后,影响最大的传播学者之一是美国学者梅罗维兹。张咏华在其专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中详细地介绍了梅罗维兹的传播思想,认为其中“深深地打上了麦氏理论的影响烙印”。梅罗维兹的传播思想主要表现在其专著《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这本书沿袭了麦克卢汉将传播技术视为社会变化的动因的基本立场,同时结合了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情境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媒介社会作用的情境论的理论:媒介的变化导致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后者决定人们的行为。这一理论认为电子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在于它重新组织了社会情境并削弱了自然场所(物质场所)及社会“场所”之间素来很密切的联系,社会情境的重新组织,使得由社会情境决定的社会行为产生相应的变化^[8]。

如果从传播媒介本身的形态来看,我们可以发

现,英尼斯主要侧重于传统的媒介如粘土、石头、纸张等的研究;其后的麦克卢汉、梅罗维兹等则侧重于电子媒介尤其是对电视的阐释。因为在他们的时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还没有足够成熟和广泛应用,但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计算机和网络的广泛运用,带来了比以往的一切传播媒介更为深刻的社会影响,这必然要求在传播技术理论上有相应的进展。事实也是如此,传播学界对媒介技术的理论阐释重心很快发生了转移,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带来的传播技术革命成为理论分析的主要命题。比如詹姆斯·贝尼格的《控制革命:信息社会的技术与经济起源》、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等都有精彩的分析。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里对信息时代传播技术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有这样的描述:“数字化的生活,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后信息时代。现代社会的种种模式正在迅速转变,形成一个以‘比特’为思考基础的新格局。比特,作为信息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9]这其中多少仍然隐含着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思维。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技术理论也必将层出不穷,这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五、传播技术神话的文化反思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不管是早期的英尼斯、麦克卢汉,还是后来的梅罗维兹、詹姆斯·贝尼格、丹·席勒和尼葛洛庞帝,他们都对传播技术有种特别的偏爱,这种偏爱使他们对传播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毫无发觉,或者视而不见。就整个传播技术理论的现代历程而言,这些理论家共同缔造了一个传播技术理论的神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对传播技术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进行反思,事实上,在西方学术史上,伴随着传播技术理论的提出,就有学者就在文化层面上对传播技术理论提出了种种诘难和质疑。事实上,正是有这种不同声音的出现,传播技术理论,乃至整个传播学的理论生态才能更平衡地发展。

同样是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也注意到了传播技术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该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指出:“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10]¹²⁹传播技术进步带来的媒介进步实际上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而该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则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媒介技术不但受到社会的全面控制,而且技术本身就是预先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设计出来的,设计

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11]。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他们看到媒介实际上是被控制的:在权力支配下产生的媒介,其运作要受到政治经济权力的控制,以至于成为权力的工具。而这在麦克卢汉等理论家那里是不被重视的,他们看重的是媒介技术决定社会,而不是社会对媒介技术的决定。

在对传播技术的认识上,直接与麦克卢汉等人发生冲突的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他在1974年出版的《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中,探讨了决定电视发展的社会物质关系,他认为公用事业电视的发展过度取决于经济、国家和他所称的易变的个人条件。在批判技术决定论和技术表征论的同时,威廉斯提出了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的“意图”问题,认为人们先在心中有了意图和期望,才去寻找和发展出电视这样的科技。“如果一个需求符合决策群体的利益,那么它将被摆在优先地位,迅速吸引各种资源并得到官方许可、批准甚或鼓励。在此基础上,一种比现有技术设备更好的、用以满足上述需求的技术便应运而生。”^[12]长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导致了工业生产的决定性转变和新社会形式的出现,进而创造了新的需要和新的可能,而各种传播系统,包括电视,则是其必然结果。因此,威廉斯认为,麦克卢汉对资本主义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视而不见,绕开了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来认识传播媒介,是在“为主导性的各种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上的理由”^[13]¹⁹⁷。

与威廉斯持有相同立场的是美国批判学派的先驱赫伯特·I·席勒。席勒认为,大众媒介紧紧联系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在其力作《思想管理者》(1973年)一书中,他指出,美国媒介受到的是双重束缚,一方面要受到来自大广告商和大公司在经济上的控制,另一方面还要受到政府在政治上的严格管理,而且,美国政府和大公司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美国媒介只不过是包括财富五百强在内的跨国大公司用以出售其产品、服务和观点的工具,是美国政府用以维护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

秩序以及推行全球霸权的工具^[12]。

因此,史蒂文森在《理解媒介文化》一书中,在肯定了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的研究之后,也不得不说:“麦克卢汉转移了人们对权力与力量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历史世界中的影响的注意力。他在理论上忽视大众传播对象象征意义的生产和对各主导性社会关系的维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这种情况排斥了与体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组织相关的各种批判性问题。”^[13]¹⁹⁹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传播技术神话的文化反思与传播技术理论本身的现代历程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两者在不断争论和冲突中给传播理论带来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传播学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北京:三联书店, 1987.
- [2] 董进泉. 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 [4] 陈力丹. 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从古登堡到“第五媒体”[J]. 国际新闻界, 2004(6): 6.
- [5] 利文森.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6] 王纬. 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理论与美加的文化战[J]. 现代传播, 1999(2): 5.
- [7] 陈卫星. 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J].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7(4): 3.
- [8] 张咏华. 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9]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
- [10]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的辩证法[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 [11]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 [12] 韦路, 严燕蓉. 媒介:讯息还是权力[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25.
- [13] 尼克·史蒂文森. 认识媒介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